· 综述 ·

卒中后抑郁相关生物学标志物及影像学的研究进展

李汉斌 陈雯

250013 济南,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通信作者: 陈雯, Email: 20076165@qq.com

DOI: 10.3969/j.issn.1009-6574.2025.10.008

【摘要】卒中后抑郁症是发生在缺血性和出血性脑梗死后的临床常见并发症,约1/3的脑卒中患者会出现卒中后抑郁,其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4~10倍。近年来,研究者一直在寻找与卒中后抑郁相关的生物学标志物,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特定的卒中后抑郁生物学标志物,但在氧化应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障碍、神经递质改变、神经营养因子变化、肠道微生物群失衡和遗传易感性方面发现一些变化。此外,影像学研究可发现卒中后抑郁患者早期脑部结构细微损伤,与生物学标志物结合可一定程度地提高卒中后抑郁的诊断与预测。现综述与卒中后抑郁相关的生物学标志物及影像学检查,旨在为了解卒中后抑郁的病理生理学、预防和治疗提供帮助。

【关键词】 卒中后抑郁; 生物学标志物; 影像学; 综述

基金项目: 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202403071100)

Research progress on biological markers and imaging related to post-stroke depression $Li\ Hanbin$, $Chen\ Wen$

Neurology Department,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First Medic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 Wen, Email: 20076165@qq.com

[Abstract] 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 is a common clinical complication occurring after ischemic and hemorrhagic cerebral infarction. About 1/3 of stroke patients develop PSD, and its incidence rate is 4 to 10 time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recent years,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identify biomarkers related to PSD. Despite the lack of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use of a particular biomarker for PSD, several changes have been observed in oxidative stress,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dysfunction, neurotransmitter alterations, neurotrophic factor changes, gut microbiota imbalance, and genetic susceptibility. In addition, neuroimaging studies can detect early subtle structural brain damage in patients with PSD, and the integration with biological biomarkers may enhance the diagnostic and predictive accuracy for this condit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biological markers and imaging examinations related to PSD, aiming to understand the pathophysiolog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SD and provide assistance.

[Key words] Post-stroke depression; Biological markers; Imaging; Review
Fund program: Shandong Provincial 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202403071100)

脑卒中是指因脑局部供血障碍致脑组织缺血、缺氧,引起脑组织坏死、软化,导致永久性组织损伤。 其临床表现为偏瘫、感觉障碍、失语、头痛、呕吐、 昏迷等,严重时可出现脑疝甚至危及生命。脑卒中 主要包括缺血性和出血性,85%是缺血性脑卒中, 12%是出血性脑卒中^[1]。主要病因包括脑血管栓塞、 狭窄、闭塞、血栓形成、痉挛等,导致大脑血流减少 从而出现脑组织缺血和细胞的过早死亡^[2]。

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常于 缺血性卒中发生后3个月内出现,表现为情绪低落、 沉默寡言、反应迟钝、兴趣与愉快感降低、悲观厌世 等精神症状,主观能动性降低、活动减少,原有躯体症状进一步加重,认知、记忆和行为功能遭受严重损害,影响功能康复,增加卒中的复发或死亡风险。这不仅降低了个人生活质量,而且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3]。通过适当的筛选方法早期发现PSD并及时开始预防和治疗,可以减轻与该疾病相关的医疗和社会经济负担。目前的研究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社会支持等因素与PSD的发生有关。在这些相关因素中,因不同研究者、不同区域与PSD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4]。因此,生物学标志物的确定及影像学检查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

PSD的预测、诊断及早期干预。(1) 生物标志物被定 义为在血液、其他体液或组织中发现的客观指标, 可预测生理或病理状态、疾病风险增加或对治疗干 预的药理学反应^[5]。与PSD相关的生物学标志物的 研究主要围绕PSD的发病机制展开,包括炎性因子、 氧化应激、神经递质改变、肠道微生物失调、遗传因 素等[4],在疾病早期预警和个体化治疗中提供帮助。 (2)影像方面: PSD的早期研究主要应用CT、MRI等 结构影像检查技术, 目多数研究侧重于卒中患者病 灶部位、体积等与PSD的关系,结论尚不统一^[4]。 目前,多模态MRI技术被应用到PSD的诊断,如弥 散张量成像、弥散张量纤维束成像、弥散峰度成像、 磁共振灌注成像、血氧水平依赖的功能性MRI等新 兴MRI技术,其在显示白质纤维束、血流灌注、脑组 织微循环、血管壁结构及病理、脑组织代谢等方面 提供更加直观及客观的评价信息,为PSD发病机制 探索、预测提供影像学帮助。现综述PSD的生物学 标志物和影像学技术,以期通过两者的结合为PSD 的预测和诊断提供多角度支持。

一、生物学标志物

1.炎性标志物: 脑卒中通过破坏下丘脑-肾上 腺-皮质(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 轴的 抑制区延长HPA轴的激活,影响海马功能,使皮质 醇增多[6],色氨酸2,3-双加氧酶和吲哚胺2,3-双 加氧酶产生,导致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 NE)和5-HT产生减少、犬尿氨酸产生增加及活性氧 产生导致PSD出现;且脑卒中激活小胶质细胞,产 生大量的炎性因子,如IL-1、IL-6、TNF- α ,增加的 IL-6参与色氨酸2,3-双加氧酶的产生,从而导致 5-HT的减少。TNF-α通过激活丝裂原活化蛋白激 酶 通 路(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 使 突触前膜处多巴胺减少,进而导致PSD出现^[7]。中 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血小板/淋巴细胞、单核细胞/ 淋巴细胞比率是目前新型目临床中易获得的炎性 因子, META分析发现PSD组三者比率较非PSD组 高[8],可能原因是脑卒中发生后,中性粒细胞可通 过受损血脑屏障到达损伤部位,改变颅内炎性状态, 从而影响神经内分泌功能,降低单胺类神经递质分 泌,导致PSD。

2.氧化应激标志物:人类大脑中的抗氧化水平较低,容易受到氧化应激的影响。脑卒中及抑郁症都伴随氧化应激增加和抗氧化防御降低^[9]。近年来,关于氧化应激与PSD之间的关系被广泛关注。临床中,作为易获得的氧化应激标志物维生素D、

同型半胱氨酸被广泛研究。(1)维生素 D。维生素 D 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 Meta分析显示低水平维生素 D使PSD发生风险增加3倍(OR=3.25)[10]。维生素 D抗抑郁特性的潜在机制是由其诱导神经营养因 子释放、抗氧化和抗炎以及其对神经传递和NE释 放的调节[10]。在动物实验中,注射骨化三醇(VitD₃) 可提高PSD模型小鼠海马维生素D受体和BDNF的 表达水平,并改善小鼠的运动功能障碍和抑郁样行 为,其中以25 μg/kg组效果最佳。注射BDNF清除 剂(TrkB-IgG) 几乎完全逆转了VitD。的抗抑郁和神 经保护作用[11]。VitD3通过调节转录因子的表达促 进调节性T细胞的功能,转录因子产生抗炎细胞因 子,如IL-10并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12],从而减 轻PSD。此外,维生素D通过上调抗氧化过程和中 断活性氧的产生减轻缺血性损伤,从而降低脑组织 中的氧化应激^[13]。动物实验发现,维生素D能改善皮 质醇水平,防止皮质醇水平升高,从而发挥抗PSD作 用[14]。目前研究发现,维生素D通过调节循环一氧化 氮和FK506结合蛋白水平发挥抗抑郁作用[15]。(2)同 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是蛋氨酸代谢为半胱 氨酸的重要代谢产物。一项238人的入院研究显示, 在经过变量校正后的3个月时,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水平≥16.5 mmol/L时PSD发生风险增加6.13倍^[16]。 Zhou等[17]的研究发现,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较高 (≥16.98 µ mol/L)的患者发生早发性PSD的风险增 加10.976倍。Jaiswal等^[18]通过Meta分析发现PSD 患者的同型半胱氨酸基线水平较高,可用作预测早 发性PSD风险的生物学标志物。升高的同型半胱 氨酸导致甲硫氨酸循环中S-腺苷甲硫氨酸的合成 减少,进而使与情绪相关的3种神经递质合成减少 和代谢紊乱,导致抑郁状态[19]。此外,同型半胱氨 酸作用于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NMDAR) 增加钙内流并引起细胞 凋亡、细胞信号传导改变[20];同时NMDARs介导的 突触可塑性参与了PSD的产生^[21]。而且同型半胱 氨酸是一种强大的兴奋性毒素,可通过氧化应激引 起神经功能障碍^[22],进而导致PSD。

3.单胺类标志物:情绪是由3种单胺类神经递质介导,主要包括5-HT、多巴胺、NE。Ji等^[23]通过阻塞左侧大脑中动脉的方法建立大鼠脑卒中模型,模拟PSD的病理状态,发现PSD组大鼠额叶皮质和海马中的5-HT、NE和多巴胺含量较对照组明显降低,与涉及5-HT和NE的通路的直接中断有关,5-HT、多巴胺、NE水平降低导致PSD的发生。口服

SSRIs连续2个月发现试验组的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安全性高,不良反应少。因其有效抑制中枢神经内5-HT和NE再摄取,且对于中枢和外周受体几乎无影响^[24]。以上均表明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变化与PSD有关。

4.神经营养因子:(1)BDNF。BDNF在哺乳动物 的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特别是在皮质和海马中表 达, 通过与酪氨酸激酶受体(tyrosine kinase receptor, Tkr)结合发挥修复受损神经、防止神经元受损和死 亡、维持神经元的存活、生长及调节突触可塑性的 作用[25]。一项研究发现,当PSD的小鼠使用低温治 疗后BDNF水平上升,抑郁症状减轻[26]。BDNF通 过磷脂酰肌醇3-激酶和Ras/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信号通路保护海马神经元免受谷氨酸毒性[27],进 而达到减轻PSD的作用。此外,在女性中,BDNF为 PSD 3个月时的重要标志物之一^[28], 主要原因是雌 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结合,作用于丝裂原活化蛋白激 酶,或直接激活酪氨酸激酶,导致环磷腺苷效应元 件结合蛋白(cyclophosphoadenosine effector binding protein, CREB) 磷酸化, CREB随后将激活BDNF 以增强BDNF-Tkr信号传导,从而减轻PSD^[29],故 BDNF可作为预测因子进一步研究。(2)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GF)。IGF-1在大 脑发育和正常生长中起着重要作用[30]。在局部缺 血的动物模型中,在不同时间通过不同途径给予外 源性IGF-1, 发现其减轻了神经损伤和伴随的行为 变化[31]。在一项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分析中,横断 面和纵向分析的结果都显示了一种"U"形的关联 模式,即较低和较高水平的IGF-1与抑郁症的风险 略有升高相关,而最低的风险出现在中位数水平附 近[32]。IGF-1通过下调环氧合酶2和诱导型一氧化 氮合酶的表达诱导MAPK信号通路,调控星形胶质 细胞 G 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而发挥抗炎作用[33], 减轻谷氨酸的神经毒性发挥神经保护作用[34],诱导 TrkB受体数量显著增加发挥增强BDNF活性作用[35], 以降低PSD患者的抑郁症状。

5.肠道微生物失调: 肠道微生物菌群通过脑-肠轴影响大脑的行为和功能。一项 Meta 分析显示, PSD 中微生物的物种和微生物群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36]。幽门螺杆菌感染的 PSD 患者的抑郁症状较对照组严重^[37]。抑郁症影响胃肠道的正常节律性运动和黏膜的分泌, 从而影响肠道菌群的类型和空间分布。肠道微生物可能参与了 PSD 发展, 其机制可能如下: (1) 改变代谢方式(嘌呤代谢、磷酸肌醇代

谢和糖酵解、糖异生途径^[38])介导大脑皮层基因表达的失调。(2)增加肠道通透性。脑卒中引起白细胞在肠黏膜中积蓄、诱导肠细胞凋亡并激活肠组织中的炎性小体,导致肠屏障损害,使肠道通透性增加。在PSD患者中肠道通透性过高的生物标志物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表现出更高的水平^[39]。

6.遗传因素: 微小RNA(microRNA, miRNA)参与调节内皮功能障碍、细胞增殖和凋亡、炎性反应、氧化应激、血管生成与神经发生。在一项临床试验中证明 miR-22 和 TrkB基因(NTRK 2)之间相关,且在 PSD患者和非 PSD患者中观察到 miR-22 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既往研究发现,升高的 miR-22 抑制与突触可塑性有关的 BDNF-ERK-CREB通路,而神经元可塑性的损伤已被证明在 PSD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miR-22 可能与 NTRK 2转录的靶 mRNA 的 30 UTR 区域结合 [40],抑制靶蛋白(TrkB)的合成及相关的信号级联反应,破坏神经元的可塑性,最终导致 PSD 的发生。miR-146 a-5 p在 PSD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异常增高 [41],可能通过 TLR、神经营养因子和 NF-κ B 信号通路影响 PSD。

7.高迁移率组蛋白1(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HMGB-1): HMGB-1是一种主要表达于神经元和小胶质细胞、与细胞外分泌后的早期炎性变化相关的核蛋白。Shan等^[42]发现PSD患者血清中的HMGB-1水平也升高,由此推测HMGB-1与PSD有关。HMGB-1参与PSD的机制如下。(1)诱导小胶质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活化以及趋化因子和细胞黏附分子的产生,从而导致PSD^[43]。(2)作为内源性炎性介质,HMGB-1由坏死细胞被动释放到缺血核心,放大炎症过程^[44],增加PSD发生风险。(3)抑制神经胶质细胞谷氨酸转运蛋白,并增加细胞外谷氨酸水平及其受体,增加谷氨酸的神经毒性^[45],导致PSD的发生。(4)损伤内皮细胞、破坏血脑屏障和增加线粒体氧化应激^[46],参与PSD产生。

8.脂质运载蛋白-2(lipocalin-2, LCN 2): 研究表明, LCN 2水平升高是PS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47]。缺血性脑卒中后星形胶质细通过NOX-NF-κB信号传导机制刺激LCN 2的表达和分泌, 阻断星形胶质细胞NHE 1有利于减少缺血性卒中后LCN 2介导的神经毒性^[48]。LCN 2通过STAT 6磷酸化放大神经炎症并促进神经元死亡和脱髓^[49], 还可经P38 MAPK通路调节海马小胶质细胞的活化参与PSD的发生和发展^[50]。综上所述可认为LCN2是PSD的潜在预测指标。

二、影像学检查

MRI检查方式使PSD的影像学检查更加精确, 为PSD的定位解剖、机制提供了更加精细的帮助。

- 1.高分辨率血管壁 MRI: 在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脑卒中患者中, 经磁共振血管成像发现颅内动脉粥样硬化与卒中后3个月患者的PSD相关^[51]。但其存在2个缺陷, 首先磁共振血管成像易受血流伪影影响, 高估狭窄的程度; 其次对血管病理的检测(如斑块内出血、脂质核心、纤维帽完整性)能力有限^[52]。在此背景下, 高分辨率血管壁 MRI作为一种新进的成像技术, 可非侵入性地对颅内动脉管腔形态(狭窄率、重构指数) 和管壁特征(斑块负荷、正性重构)进行定量分析^[53]。目前的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 急性期高分辨率 MRI 检测的症状性斑块可作为早发 PSD的独立预测因子(OR=1.034, 95%CI: 1.014~1.055, P=0.001)^[54],提示斑块的炎性和易损性与PSD有关, 这为PSD的病理检查提供了帮助。
- 2. 静息态功能 MRI: 静息态功能 MRI 能探测大 脑在静息状态下的自发性神经元活动, 反映脑区 域之间相关性的网络连接,静息态MRI主要通过 局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低频振幅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功能 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反映神经元的活动, 其在PSD中多采用ReHo、ALFF反映脑神经活动。 张帆等[55]通过研究PSD患者小脑各部位ReHo发现 右侧小脑前叶、小脑后叶上部及小脑后叶下部ReHo 值降低。杨蓉蓉和朴翔字[56]通过ALFF分析PSD组 及非PSD组,发现PSD组右侧后扣带回、楔前叶区、 距状裂周围皮层的ALFF 值显著降低, 考虑与边缘 系统-皮质-纹状体-苍白球-丘脑环路有关。张 佩瑶等[57]发现PSD相关默认网络中相关脑区的FC 发生变化,如右颞下回和左顶下回FC升高,两侧楔 前叶、右颞中回以及左额上回FC降低,表明默认网 络与PSD发病机制有关。Wu等[58]通过收集静息状 态ALFF数据发现ALFF的频率依赖性和时变特性 可以以互补的方式反映PSD特异性改变。
- 3.弥散张量成像:弥散张量成像是对水分子的自由热运动的各向异性进行量化分析,目前能活体显示脑白质微观结构完整性的无创影像技术。其核心参数包括各向异性分数、平均扩散系数,利用彩色图像以三维的形式显示白质纤维束的走行、方向、排列、紧密度、髓鞘化程度及病理损伤范围[59]。一项39例回顾性研究发现PSD组前额叶、海马、扣带回及胼胝体膝部的病灶侧,小脑中脚、小脑下脚的

病灶对侧的FA值均显著低于对侧(P<0.05),提示PSD的发生可能与前额叶背外侧神经环路、边缘系统及小脑结构受损有关^[60]。

- 4. 弥散峰度成像: 弥散张量成像基于水分子 扩散服从高斯分布的假设,但人体内存在的细胞 膜、髓鞘等限制扩散的屏障, 使水分子在组织中的 扩散并不服从高斯分布。弥散峰度成像作为弥散张 量成像的一种扩展,其是一种研究水分子弥散的非 高斯分布效应的方法,能克服弥散张量成像的局限 性,更准确地描述扩散信号,提供更丰富的组织微 观结构信息[61]。其核心参数包括各向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和平均峰度(mean kurtosis, MK)。其中 MK 值越高提示组织微观结构复杂度越强。Shen等[62] 发现, PSD组的左额叶FA值, 双侧额叶、双侧颞叶 及胼胝体外侧区MK值降低。颞叶内侧是边缘系统 的组成成分,此外胼胝体是连接两侧大脑半球并连 接额叶、顶叶、颞叶、枕叶的连合纤维,在人脑中起 着信息整合和传递的重要作用。因此, 颞叶、胼胝 体白质微结构损伤可能是PSD的早期原因之一,弥 散峰度成像可作为PSD早期预测的影像学检查。
- 5.弥散张量纤维束成像: 弥散张量纤维束成像是由弥散张量成像发展而来,可显示白质纤维束的3D图像,用于探索双相障碍、脑创伤后情感障碍等脑白质微观结构变化。祁杰等^[63]应用弥散张量纤维束成像技术观察PSD组患者,发现额枕束、皮质脊髓束、额桥束、扣带束、钩束的白质结构损伤与PSD程度有关,提示PSD的机制牵扯多环路功能障碍,故弥散张量纤维束成像可作为PSD的影像学检查手段。
- 6.磁共振灌注成像:磁共振灌注成像可检测脑卒中患者脑血流灌注情况及脑卒中的范围,为临床治疗方面提供了血流动力学的参数。赵清河等^[64]发现,PSD合并认知障碍组的双侧额叶脑、左侧颞叶和右侧基底节脑血流显著低于卒中组(P<0.05),提示PSD合并认知障碍的发生可能和患者双侧额叶、左侧颞叶、右侧基底节区的血流灌注减少造成的局部脑功能异常有关。但磁共振灌注成像的勾画感兴趣区会存在人为的因素,如选择的范围大小、层面、标准等,故需加强对数据统计的标准衡量。
- 7.质子磁共振波谱: 质子磁共振波谱是一种非侵入性的成像方式,可观察受损脑区的代谢变化。与PSD有关的代谢物质多为氮-乙酰天冬氨酸(N-acetyl aspartate, NAA)、胆碱(choline, Cho)、肌

酸(creatine, Cr)。潘才钰等^[65]通过质子磁共振波谱发现PSD组两侧丘脑NAA/Cr比值小于健康对照组;Zhang等^[66]应用质子磁共振波谱发现PSD对侧小脑与卒中病变的Cho/Cr和Cho/NAA比值均高于健康者;Qiao等^[67]也通过质子磁共振波谱发现PSD组的额叶、颞叶、扣带前回Cho/Cr比值明显高于非PSD组。以上研究均发现PSD发病与脑内代谢改变有关。

三、总结与展望

本文介绍了多种生物学标志物及其引起PSD的可能作用机制,脑卒中在大脑区域引发强烈的炎性反应,炎性细胞因子影响HPA轴活性,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从而下调海马中的BDNF水平,进一步导致PSD的发展。脑卒中可中断单胺类物质向大脑的投射使得脑情绪调节区的单胺减少,进而导致PSD;肠道微生物菌群也可通过改变代谢途径、肠道通透性等机制作用于PSD,而遗传因子则通过各种通路影响PSD的发生。各种新兴的影像学检查不仅明确了PSD定位,还可以进一步了解脑部受损微结构、代谢、血管壁病理变化,为PSD机制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未来可进一步规范采样时间、研究人群、招募环境、评估时间点、测量抑郁症状的工具,加大样本量,长期连续追踪进行生物标志物采样及影像学检查,动态研究脑结构及脑功能的变化,完善PSD整体机制网络,深化PSD发病机制,做到对PSD的早发现、早治疗。

利益冲突 文章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论文撰写为李汉斌,论文修订为陈雯

参 考 文 献

- [1] Mozaffarian D, Benjamin EJ, Go AS, et al.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statistics--2015 update: a repor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J]. Circulation, 2015, 131(4): e29-e322. DOI: 10.1161/CIR.0000000000000152.
- [2] Broughton BR, Reutens DC, Sobey CG. Apoptotic mechanisms after cerebral ischemia[J]. Stroke, 2009, 40(5); e331-339. DOI: 10.1161/STROKEAHA.108.531632.
- [3] Sivolap YP, Damulin IV. Stroke and depression [J]. Zh Nevrol Psikhiatr Im S S Korsakova, 2019, 119(9): 143-147. DOI: 10.17116/jnevro2019119091143.
- [4] Guo J, Wang J, Sun W, et al. The advances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2021 update[J]. J Neurol, 2022, 269(3): 1236-1249. DOI: 10.1007/s00415-021-10597-4.
- [5] Kim SJ, Moon GJ, Bang OY. Biomarkers for stroke [J]. J Stroke, 2013, 15(1): 27-37. DOI: 10.5853/jos.2013.15.1.27.
- [6] Zhou L, Wang T, Yu Y, et al. The etiology of poststrokedepression: a hypothesis involving HPA axis[J]. Biomed

- Pharmacother, 2022, 151; 113146. DOI: 10.1016/j.biopha.2022. 113146.
- [7] Feng X, Ma X, Li J, et al. Inflammatory pathogenesis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J]. Aging Dis, 2024, 16(1): 209-238. DOI: 10.14336/AD.2024.0203.
- [8] Cheng Y, Wang Y, Wang X, et al.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and monocyte-to-lymphocyte ratio in depression: An updated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Front Psychiatry, 2022, 13: 893097. DOI: 10.3389/ fpsyt.2022.893097.
- [9] Chun HY, Ford A, Kutlubaev MA, et al.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uicide after stroke; a narrative review of the best available evidence [J]. Stroke, 2022, 53(4): 1402-1410. DOI: 10.1161/STROKEAHA.121.035499.
- [10] Hung KC, Wu JY, Illias AM, et al. Association of a low vitamin D status with risk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a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J]. Front Nutr, 2023, 10: 1142035. DOI: 10.3389/fnut.2023.1142035.
- [11] Xu Y, Liang L. Vitamin D3/vitamin D receptor signaling mitigates symptoms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in mice by upregulating hippocampal BDNF expression[J]. Neurosci Res, 2021, 170: 306-313. DOI: 10.1016/j.neures.2020.08.002.
- [12] Lopez DV, Al-Jaberi F, Woetmann A, et al. Macrophages control the bioavailability of vitamin D and vitamin D-regulated T cell responses [J]. Front Immunol, 2021, 12: 722806. DOI: 10.3389/fimmu.2021.722806.
- [13] Pál É, Ungvári Z, Benyó Z, et al. Role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J]. Nutrients, 2023, 15(2); 334. DOI; 10.3390/nu15020334.
- [14] Al-Ramadhan FR, Abulmeaty M, Alquraishi M, et al. Effect of vitamin D3 on depressive behaviors of rats exposed to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J]. Biomedicines, 2023, 11(8): 2112. DOI: 10.3390/biomedicines11082112.
- [15] Gammoh O, Ibrahim A, Qnais E, et al. Vitamins C and D exhibit similar antidepressant effects to escitalopram mediated by NOx and FKBPL in a stress-induced mice model[J]. Nutrients, 2023, 15(12): 2692. DOI: 10.3390/nu15122692.
- [16] Li Y, Cao LL, Liu L, et al. Serum levels of homocysteine at admission are associated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J]. Neurol Sci, 2017, 38(5): 811-817. DOI: 10.1007/s10072-017-2848-2.
- [17] Zhou H, Wang C, Wang W, et al. Lesion location and serum levels of homocysteine are associated with early-onset post-stroke depression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J]. Brain Behav, 2023, 13 (10); e3210. DOI: 10.1002/brb3.3210.
- [18] Jaiswal V, Ang SP, Suresh V,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baseline high-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omocysteine levels, and poststroke depression among stroke pati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meta-analysis, and meta-regression[J]. Curr Probl Cardiol, 2024, 49(3): 102338. DOI: 10.1016/j.cpcardiol.2023.102338.
- [19] Bhatia P, Singh N. Homocysteine excess: delineating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neurotoxicity and depression [J]. Fundam Clin Pharmacol, 2015, 29(6): 522-528. DOI: 10.1111/fcp.12145.
- [20] Poddar R, Chen A, Winter L, et al. Role of AMPA receptors in homocysteine-NMDA receptor-induced crosstalk between ERK and p38 MAPK[J]. J Neurochem, 2017, 142(4): 560-573. DOI: 10.1111/jnc.14078.

- [21] Wang M, Liang X, Zhang Q, et al. Homocysteine can aggravate depressive like behaviors in a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reperfusion rat model: a possible role for NMDARs-mediated synaptic alterations [J]. Nutr Neurosci, 2023, 26(6): 483-495. DOI: 10.1080/1028415X.2022.2060642.
- [22] Kang J, Wang D, Duan Y, et al. Aerobic exercise prevents depression via alleviating hippocampus injury in chronic stressed depression rats[J]. Brain Sci, 2020, 11(1): 9. DOI: 10.3390/brainsci11010009.
- [23] Ji XW, Wu CL, Wang XC, et al.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and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2 in the brains of ra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J]. Exp Ther Med, 2014, 8(1): 159-164. DOI: 10.3892/etm.2014.1674.
- [24] 李春燕.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药物治疗脑卒中后 抑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20, 14(21): 139-141.DOI: 10.14164/j.enki.en11-5581/r.2020.21.061.
- [25] Castrén E, Monteggia LM.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signaling in depression and antidepressant action[J]. Biol Psychiatry, 2021, 90(2): 128-136. DOI: 10.1016/j.biopsych. 2021.05.008.
- [26] Zhong W, Yuan Y, Gu X, et al. Neuropsychological deficits chronically developed after focal ischemic stroke and beneficial effects of pharmacological hypothermia in the mouse[J]. Aging Dis, 2020, 11(1): 1-16. DOI: 10.14336/AD.2019.0507.
- [27] Chen HH, Zhang N, Li WY, et al. Overexpression o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in the hippocampus protects against post-stroke depression [J]. Neural Regen Res, 2015, 10(9): 1427-1432. DOI: 10.4103/1673-5374.165510.
- [28] Qiu X, Wang H, Lan Y, et al. Blood biomarkers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after minor stroke at three months in males and females [J]. BMC Psychiatry, 2022, 22(1): 162. DOI: 10.1186/s12888-022-03805-6.
- [29] Jiang H, Xiao L, Jin K, et al. Estrogen administration attenuates post-stroke depression by enhancing CREB/BDNF/TrkB signaling in the rat hippocampus[J]. Exp Ther Med, 2021, 21(5): 433. DOI: 10.3892/etm.2021.9850.
- [30] Serhan A, Aerts JL, Boddeke E, et al. Neuroprotection by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n rats with ischemic stroke is associated with microglial changes and a reduction in neuroinflammation [J]. Neuroscience, 2020, 426: 101-114. DOI: 10.1016/j.neuroscience.2019.11.035.
- [31] Hayes CA, Valcarcel-Ares MN, Ashpole NM.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evidence of IGF-1 as a prognostic marker and acute intervention with ischemic stroke [J].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021, 41(10); 2475-2491. DOI: 10.1177/0271678X211000894.
- [32] Chigogora S, Zaninotto P, Kivimaki M, et al.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and risk of depression in older people: the 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 [J]. Transl Psychiatry, 2016, 6(9): e898. DOI: 10.1038/tp.2016.167.
- [33] Yuan LJ, Zhang M, Chen S, et al.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of IGF-1 is mediated by IGF-1R cross talk with GPER in MPTP/MPP(+)-induced astrocyte activation [J]. Mol Cell Endocrinol, 2021, 519: 111053. DOI: 10.1016/j.mce.2020.111053.
- [34] Prabhu D, Khan SM, Blackburn K, et al. Loss of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signaling in astrocytes disrupts glutamate handling[J]. J Neurochem, 2019, 151(6): 689-702. DOI: 10.1111/jnc.14879.

- [35] Zhang C, Wang X, Zhu Q, et al. Decreased serum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in poststroke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Front Psychiatry, 2022, 13: 876557. DOI: 10.3389/fpsyt.2022.876557.
- [36] Luo F, Fang C. Association between gut microbiota and poststroke depression in Chinese population; a meta-analysis [J]. Heliyon, 2022, 8(12); e12605. DOI: 10.1016/j.heliyon.2022. e12605.
- [37] Sun M, Chen H, Dong S, et al. Alteration of gut microbiota in poststroke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J]. Neurobiol Dis, 2024, 193: 106458. DOI: 10.1016/j.nbd.2024. 106458.
- [38] Li X, Han G, Zhao J, et al. Intestinal flora induces depression by mediating the dysregulation of cerebral cortex gene expression and regulating the metabolism of stroke patients [J]. Front Mol Biosci, 2022, 9: 865788. DOI: 10.3389/fmolb.2022.865788.
- [39] Zhong J, Chen J, Cao M, et al. Elevated plasma intestinal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and aberrant lipid metabolism predict post-stroke depression [J]. Heliyon, 2022, 8(11): e11848. DOI: 10.1016/j.heliyon.2022.e11848.
- [40] Hu J, Zhou W, Zhou Z, et al. miR-22 and cerebral microbleeds in brainstem and deep area are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one month after ischemic stroke[J]. Braz J Med Biol Res, 2020, 53(5): e9162. DOI: 10.1590/1414-431x20209162.
- [41] Chen Z, Wang N, Na R, et al. Bioinformatic prediction of depression-related signaling pathways regulated by miR-146a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J]. Cell Mol Biol (Noisy-le-grand), 2022, 68(6): 40-47. DOI: 10.14715/ cmb/2022.68.6.7.
- [42] Shan W, Xu L, Qiu Z, et al. Increased high-mobility group box 1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 [J]. Neurol Sci, 2022, 43(5): 3131-3137. DOI: 10.1007/s10072-021-05571-x.
- [43] Wang C, Jiang J, Zhang X, et al. Inhibiting HMGB1 reduces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in diabetic mice[J]. Inflammation, 2016, 39(6): 1862-1870. DOI: 10.1007/s10753-016-0418-z.
- [44] Ye Y, Zeng Z, Jin T, et al. The role of 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in ischemic stroke[J]. Front Cell Neurosci, 2019, 13: 127. DOI: 10.3389/fncel.2019.00127.
- [45] Bonanno G, Raiteri L, Milanese M, et al. The high-mobility group box 1 cytokine induces transporter-mediated release of glutamate from glial subcellular particles (gliosomes) prepared from in situ-matured astrocytes [J]. Int Rev Neurobiol, 2007, 82:73-93. DOI: 10.1016/S0074-7742(07)82004-6.
- [46] Villa RF, Ferrari F, Moretti A. Post-stroke depression: Mechanisms and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J]. Pharmacol Ther, 2018, 184: 131-144. DOI: 10.1016/j.pharmthera.2017.11.005.
- [47] Liu Y, Liu L, Zhi Z, et al. Higher serum lipocalin 2 is associated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at discharge[J]. BMC Neurol, 2023, 23(1): 294. DOI: 10.1186/s12883-023-03319-y.
- [48] Liu R, Wang J, Chen Y, et al. NOX activation in reactive astrocytes regulates astrocytic LCN2 expression and neurodegeneration [J]. Cell Death Dis, 2022, 13(4): 371. DOI: 10.1038/s41419-022-04831-8.
- [49] Zhao RY, Wei PJ, Sun X, et al. Role of lipocalin 2 in stroke [J]. Neurobiol Dis, 2023, 179: 106044. DOI: 10.1016/j.nbd. 2023.106044.

- [50] Wei L, Du Y, Xie Y, et al. Lipocalin-2 regulates hippocampal microglial activation in poststroke depression [J]. Front Aging Neurosci, 2021, 13; 798335. DOI: 10.3389/fnagi.2021.798335.
- [51] Chen YK, Qu JF, Xiao WM, et al.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sis and poststroke depression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J]. J Stroke Cerebrovasc Dis, 2016, 25(4): 998-1004. DOI: 10.1016/j.jstrokecerebrovasdis.2015.12.038.
- [52] Song JW, Wasserman BA. Vessel wall MR imaging of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sis [J]. Cardiovasc Diagn Ther, 2020; 10(4): 982-993. DOI: 10.21037/cdt-20-470.
- [53] Arenillas JF, Dieleman N, Bos D. Intracranial arterial wall imaging: techniques, clinical applicability,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J]. Int J Stroke, 2019, 14(6): 564-573. DOI: 10.1177/1747493019840942.
- [54] Liu F, Song M, Huang X, et al. Symptomatic plaque enhancement is associated with early-onset post-stroke depression [J]. J Affect Disord, 2022, 306; 281-287. DOI: 10.1016/j.jad.2022.03.026.
- [55] 张帆,姜洪新,郑石磊,等.卒中后抑郁患者小脑静息态功能 磁共振改变的临床观察[J].锦州医科大学学报,2022,43(4): 48-52. DOI: 10.13847/j.cnki.lnmu.2022.04.015.
 - Zhang F, Jiang HX, Zheng SL, et al.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he alternations of cerebellum by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J]. Journal of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022, 43(4): 48-52.
- [56] 杨蓉蓉, 朴翔宇. 卒中后抑郁患者的脑区功能活动分析[J]. 河北医药, 2019, 41(19): 3007-3009. DOI: 10.3969/j.issn.1002-7386.2019.19.034.
 - Yang RR, Piao XY. Analysis for the brain region activities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J]. Hebei Medical Journal, 2019, 41(19); 3007-3009.
- [57] 张佩瑶, 王晶, 王君, 等.缺血性亚急性期卒中后抑郁患者默认网络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J].磁共振成像,2020,11(8):615-619. DOI: 10.12015/issn.1674-8034.2020.08.004.
 Zhang PY, Wang J, Wang J, et al.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study of default mood network in patients with subacute post-ischemic stroke[J]. Chinese Journal of
- [58] Wu X, Wang L, Jiang H, et al. Frequency-dependent and timevariant alterations of neural activity in post-stroke depression: 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J]. Neuroimage Clin, 2023, 38: 103445. DOI: 10.1016/j.nicl.2023.103445.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2020, 11(8): 615-619.

- [59] Hao X, Liu Z, He S, et al. Application of DTI and fMRI in moyamoya disease [J]. Front Neurol, 2022, 13: 948830. DOI: 10.3389/fneur.2022.948830.
- [60] 陈玥寰, 隋汝波. 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对卒中后抑郁的诊断价值[J]. 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 2024, 32(1): 42-47. DOI: 10.3969/j.issn.1005-5185.2024.01.007.

- Chen YH, Sui RB. Diagnosis of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in poststroke depression [J].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Imaging, 2024, 32(1): 42-47.
- [61] Kamiya K, Kamagata K, Miyajima M, et al. Diffusional kurtosis imaging in idiopathic normal pressure hydrocephalus: correlation with severity of cognitive impairment[J]. Magn Reson Med Sci, 2016, 15(3): 316-323. DOI: 10.2463/mrms.mp.2015-0093.
- [62] Shen XY, Fan ZX, Wang L, et al. Altered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e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detected by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J]. Neurol Sci, 2019, 40(10): 2097-2103. DOI: 10.1007/s10072-019-03947-8.
- [63] 祁杰,张磊,邓丽君,等.卒中后抑郁患者脑白质纤维束改变及其与抑郁程度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22,25(9): 1123-1129,1135.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1.02.079. Qi J, Zhang L, Deng LJ, et al. Brain white matter fiber bundle alterations and severity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J]. Chinese General Practice, 2022, 25(9): 1123-1129,1135.
- [64] 赵清河,刘学军,郭永华.脑卒中后抑郁合并认知功能障碍的磁共振灌注成像观察[J]影像研究与医学应用,2022,6(1): 28-30. DOI: 10.3969/j.issn.2096-3807.2022.01.010.

 Zhao QH, Liu XJ, Guo YH. Observation of magnetic resonance perfusion imaging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J]. Journal of Imaging Research and Medical Applications, 2022, 6(1): 28-30.
- [65] 潘才钰,王永盛,王萃莉,等.卒中后抑郁患者丘脑代谢物变化特点的磁共振波谱分析[J].中国现代医生,2019,57(15):20-23,27.

 Pan CY, Wang YS, Wang PL, et al.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analysis of metabolic changes of thalamus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J]. China Modern Doctor, 2019,57(15);20-23,27.
- [66] Zhang L, Sui R, Zhang L, et al. Morphological and metabolic alteration of cerebellum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J] Cell Physiol Biochem, 2016, 40(3/4): 420-430. DOI: 10.1159/000452557.
- [67] Qiao J, Sui R, Zhang L, et al. Construction of a risk model associated with prognosis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based 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J]. Neuropsychiatr Dis Treat, 2020, 16: 1171-1180. DOI: 10.2147/NDT.S245129.

(收稿日期: 2024-11-04) (本文编辑: 王影)